

抗战时期的姜琦教育思想研究

曹振明¹, 姚聪莉²

(1. 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2. 西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姜琦是曾在西北联大任教任职的我国著名教育家。全面抗战时期,姜琦坚决反对将“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割裂为二,强调教育哲学的持续研究并形成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突出对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国家教育设施的具体对策等。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展现出其在宽广的世界眼光中积极探索和勇于构建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高度使命自觉。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姜琦;教育思想;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7)02-0023-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se.2017.02.004

姜琦(1886—1951年),字伯韩,浙江永嘉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归国后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任职并被聘为多所高等学校校长。全面抗战时期,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注册主任及先修班主任。作为现代学科,教育学和教育哲学兴起于近现代的西方。姜琦是我国最早研究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初即提出“研究新教育之要件有三:(一)介绍,(二)批评,(三)发明,……当更益之以发明”^[1],毕生致力于自觉探索、构建和推进中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发展道路。他虽因受时代条件限制而坚持以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但又积极借鉴和采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展现出思想的独特个性。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视为“国民党反动派”^[2]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其教育思想所作出的考察依然十分薄弱。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其在宽广的世界眼光

中将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中国化”探索和构建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

一、构建教育哲学“没有所谓‘平时’和‘战时’之分”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序幕的拉开,对于中国教育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及其发展方向问题,当时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分歧。面对中国教育何去何从的争论,姜琦坚决反对中断平时教育而紧急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时特殊教育的看法,坚持主张国家教育不应受到“战时”或“平时”的左右,而应有“一贯的基本精神”,“凡是教育的实施方法,都应该以此为依据”^[3]。

姜琦认为,平时教育原本就应包括战时教育的必要内容,战时教育应是平时教育的组成部分,即“战时即平时”“平时即战时”,要把“‘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打成一片,始终一贯地以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的基本精神”;倘若“一旦碰到抗战才去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曹振明(1986—),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校史校志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研究;

姚聪莉(1964—),女,陕西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谈‘战时教育’，那么，这不啻像‘临时抱佛脚’一般；复次，一旦缓和外侮，又来讲所谓‘平时教育’，那么，这不啻好像‘贼去紧关门’一般”。他还指出，战争时期应当更加强调民族主义教育，但中国教育的基本精神“三民主义”的内涵是丰富的，不仅包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和，而且包括“国际正义”“人类和平”“大同主义”的内容，因此，对于“只高唱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战时教育，姜琦表示极力反对^{[3][4]}。

针对当时出现的急功近利式的战时特殊教育观点，姜琦特别强调，“我们越碰着战时，我们越需要教育哲学”。他强调，“原来教育哲学本来是为着解决全时代教育上所有的一切矛盾和纠纷而有所需要的”，当时的中国教育在平时尚且存在诸多不足，战时“教育上一切矛盾和纠纷比之所谓平时越加发现”，因此教育哲学的构建“更没有所谓‘平时’和‘战时’之分”，“尤其在这国难到达极严重的时节……越要继续不断地做下去”^{[3][5]}。

姜琦在 20 世纪初即开始发表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的研究论著，特别是 1933 年出版的《教育哲学》，系统地论述和阐发了自己关于教育哲学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在此书中，姜琦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结合，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以民生或社会生产力为本质，以世界大同为究竟”的论断，认定此书在本质上是一部“民生史观”或“唯物史观”的教育哲学^{[6](P89, 238-239)}。

全面抗战爆发后，姜琦对于构建“教育哲学体系”更加自觉和明确^[5]，并对《教育哲学》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重要修正，最终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

一是在教育本质上，修正教育本质是民生或社会生产力论断，明确规定“教育之本质是民生”。他指出，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而“民生”包涵“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等丰富内容，这“不但否定马克思认为经济（即物质）是一切事物（教育当然也被包括在内）之最后的决定要素，并且可以使我们推论起来而认为杜威的‘教育就是生活’这种主张还有商榷的余地”，因而姜琦提出“教育之本质是民生；再短简地说：‘教育就是民生’”^[7]。

二是在方法论上，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础上，提出“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姜琦强调，

教育哲学不必过于纠缠哲学“本体”，而应更加关注“本体的属性——发展、变化、生长、消灭等等，而约称之为‘生’”。所以，“我在宇宙观上称为‘唯生论’，在社会观与历史观上称为‘民生史观’或‘唯生史观’，在方法论上称为‘民生的辩证法’或‘唯生的辩证法’”。而所谓“实践”，除与“理论”相对的涵义外，“与所谓‘特殊的’相近”——“照顾着中国社会自身所固有的特殊性而实践着，所以我再进一步地把它称为‘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或‘实践的唯生的辩证法’”^[5]。

三是在“实行程序”上，提出“从每一个被教育者自己所固有的性能做出发点，逐渐地进入于成人社会底阶段”。姜琦认为，历史是人类的连续，社会是人类的集合，民生所谓“生活、生存、生计或生命，这些都不是纯个人的，乃一定是人民的、社会的、国民的或群众的（即民族的）”，因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不同于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欧美教育哲学，它是“集体主义”，“处处以集体为前提，以组织为手段”，但“并非牺牲个人人格，积极地说，它却是很尊重个人意志的”。因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一面要适应个性差异，一面要适应社会需要；合言之，它认为‘个性差异’与‘社会需要’二者可以相互综合的。不过，……在整个的教育之过程上看来，个人究竟只是教育底起点，而社会却是教育底目的”^{[7][8]}。

二、积极探索“德育原理”与“教育设施”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姜琦自觉地意识到，国民的道德教育问题应当引起教育领域的足够重视。他在反思中国道德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以往的道德教育存在根本性缺陷，即在各级学校中德育科目只讲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而忽视了道德教育究竟是什么的基本问题，缺乏关于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的认知和把握。因此，继 20 世纪初出版《中国国民道德概论》等之后，他于 1944 年又先后出版了《训育与心理》《德育原理》《中国国民道德原论》等专著，对国民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融教育心理、道德教育等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于一体，是以上诸书的鲜明特点。

《训育与心理》除探讨“坊间已出版的一般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外，“特重视行为、品性及情绪方面之养成，对于整个人格之训练原理、原则，特别注

重”，在“略述现代各派教育心理学之得失”的基础上，“从三民主义教育哲学立场”构建“一新的或说‘训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说”，“弥补以往教育心理学偏重学科学习方面（智力方面）之缺点”^{[9]（P1）}。

《德育原理》分“道德之概念”“道德之本质”“道德之法则”“道德之内容”“道德之变态”“道德教育”“传统道德”“道德运动”“道德测验”“道德与真、美、神”“道德之目的”等章，“一面阐发道德教育的理论，一面讨论道德教育的实践问题”，“企图将种种的理论，贯注于实施之中”，“虽也多力引征欧美名家道德学说”，“但均以阐发中国道德的哲理为旨趣”，致力于构建“三民主义之渊源于中国一贯的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的“德育之理论与实施”^[10]。

姜琦认为，他在1917年出版的《中国国民道德概论》，受当时社会情形和世界潮流的影响，只讲了怎样发展健全人格，过于侧重个人自由，但时过境迁，已经不能适用于抗战建国的新形势了。他强调：“深深觉得伦理建设是决定我中国的命运之一件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就不揣谫陋，聊尽国民所应有的一分天职，发愿编纂这部书（即《中国国民道德原论》）。”^{[11]（P2）}本书共十章，分别为“绪论”“国民道德之意义”“中国国民道德之本质”“中国国民道德之现象”“中国国民道德之法则”“中国国民道德之纲要”“中国国民道德之教育”“中国国民道德之实践”“中国国民道德之目的”及“结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力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民道德教育，注重融基本理论与德育实践于一炉。

其实，国民道德教育的探究是姜琦面对抗战建国的时代任务、自觉构建和积极推行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原则的理论成果。在以上著作出版之际，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学家顾毓琇基于“新中国的建设，必须以伦理建设为经，以他种建设为纬，伦理的精神，必须贯注到各种建设之中”的判断，强调姜琦国民道德教育著作“出现于近日中国社会亟需伦理建设与各级学校积极推行训导之际”，“我们认为很有意义，很足称述”^[10]。

姜琦所谓的“教育设施”与“教育理论”相对，主要是指中国教育的政策、措施及其具体实施等。全面抗战期间，除研究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外，姜琦还对中国学制、大学教育、师范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侨民教育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研究。限于篇幅，以下暂观前三者。

关于中国学制。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学制“支离

破碎”“各级学校间之系统相互脱节”的弊端，姜琦指出，中国的学制应“有所通盘计划”，并提出“三大原则”：“一、中国教育的质量需要普及，二、中国的教育质量须要适应，三、中国教育的质量与数量须要相互调剂”。“数量普及”虽指“把一切教育——自幼稚教育起以至于高等教育止——都严厉地普及起来”，但主要指属于“一般教育”的“小学教育”，这种教育不分性别，不分种族，“尤其不分阶级”，主要“教儿童以关于职业上所需要之初步的知能及培养成他们从事某种职业之刻苦勤劳的习惯和服务社会事业之克己牺牲的精神”。“质量适应”即“按照儿童底智能之高低及其兴趣和志向之如何授以各种各样的教育”，它与逐渐趋向“专门教育”的“中等以上各阶段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相互调剂”指“谈到数量不可忘掉它底质量，谈到质量又不可忘掉它底数量”，即“谋数量与质量之综合”，如中等以上各阶段的教育在注重“质”的同时，倘若“能够做到充实和多样的地位，那么，一切青年子弟底智能有所发展，材能有所造就，兴趣有所表现及其志向有所遂行。这就是重质同时重量的意思”。在时间分配上，主张实行“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制度，高等教育则视专业而定^[12]。

关于大学教育。姜琦认为，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专业知识而忽视道德品性、身体素质等问题。他指出，“教育机关，尤其大学，如果只知讲解知识，甚至只知灌输书本上底知识，而不知同时训练或者培养青年子弟日常做事和终身做人的德行，那么，这种教育是一种偏枯的教育，并不是一种全面观的教育”^[13]。他强调，“大学教育之特质”在于“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应该谋相合一”，“以‘知’为先，‘行’为重”^[13]；应将“知识传授”“德行陶冶”“身体锻炼”结合起来，“使‘教’与‘训’打成一片或使‘训’与‘导’化为一体”，贯彻“教”“训”“导”“管”“卫”的统一^[14]。此外，为了训导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他主张在导师分配上应区分并合理分配“宗教的教师”“审美的教师”“理论的教师”“经济的教师”“政治的教师”“社会的教师”等“六种型式”^[15]；在与学校各学科及课程关系上，“学校训育尤其大学训导并非单靠训导本身所能奏效，乃必须与学校课程上所有一切学科互相联络，方克有济”^[16]。

关于师范教育。缺乏师资是当时中国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师范教育引起姜琦的特别重视。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师范教育”发展历史作了细致梳理，将其划分为“诞生时期”“发育时期”“衰微时期”

“死灭时期”和“复活时期”，并对各阶段的得失利弊予以总结和评判。在此基础上，姜琦提出“促成它可以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名称”上，不宜采用“师范学院”，建议使用“师范院”“高等师范学校”或“师范大学”；在“设置”上，应“一律独立设置，而不可附设于各大学之内”；在“统制”上，为防止旧日师范教育所易造成的“北高师派”“南高师派”“武昌高师派”等“分门别户、互相倾轧”，建议“与其取地命名，不如以数字为记号称之为‘国立第一……’‘国立第二……’等等，……并且在训练的时期中，把各个学校底学生互相调动……学校校长和教员也时常互相调动”；在“课程”上，全国高师要“统一”，且“以哲学、历史、音乐、体操为绝对的必修科，其次论理学也是一种必修科。因为这些科目无论于德性、思想、志向、兴趣、体魄都有莫大的帮助的缘故”^[17]。

三、“创造出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

姜琦对于构建中国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高度自觉，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他在秉持“三民主义”精神宗旨的同时，注意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广泛察知世界教育思潮，以期在中国“自身底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

虽然姜琦对其《教育哲学》“有偏于唯物论的辩证法之嫌”^[5]曾作出检讨和修正，但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中，姜琦实际上依然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甚至是积极地予以借鉴和采纳。他提出的“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不断“生长”。而这种“生长”，一是“一定先有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组织作为根据”，二是“由量变到质变”，三是符合于“‘正’‘反’‘合’这一个公式”。同时，在讨论中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系列问题时，姜琦大量地运用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基本思维，致力于在世界教育思想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创建出中国自己的“特殊”的教育思想，认识到“谈到普遍性不可忘掉特殊性，谈到特殊性也不可忘掉普遍性”，“所谓‘一般’，一定是由许多特殊事实里面把握的；设使离开特殊事实，那么，所谓‘一般’，就无所附着，不啻‘空中楼阁’一般”^{[5][7]}。这些观点明显地展现出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反合”的螺旋上升、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不难发

现，全面抗战时期，姜琦教育思想特别是其教育哲学思想的构建，依然积极借鉴和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抗战时期姜琦建立自己教育思想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姜琦早年留学日美，并游历过欧洲主要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好的认知和把握。全面抗战时期，在研究教育思想过程中，姜琦同样将中国教育发展放置于整个世界大背景中，展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他指出：“我们在说明三民主义教育以前，则不能不先把世界教育思潮做一度分析的研究，然后再来拿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与他们比较，看看彼此有何共通之点及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之特殊性究竟何在。”^[18]他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教育思潮：一是“法西斯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当时的德、意、日等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国家或民族为至上，具有集中化、军事化、民族化、农村化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苏俄或苏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具有平等化、生产化、政治化特点；三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英、美、法等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它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具有平等化、社会化、个性化特点^[18]。姜琦指出，“中国底现代教育之改革，还是受西洋教育之影响”^[19]，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1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姜琦对历史上的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发展道路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较早地形成了努力探索“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发展道路的使命自觉，更在全面抗战时期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教育哲学体系”的重大学术问题。他指出，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不拘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好，或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它必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和哲学的基础存在着，并非凭空虚构的”^[12]；“大凡一个国家，必有她自身底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因此，她又必根据她自身所有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创立一种独特的主义作为建国和治国之基础”^[20]；“世界上任何国家均必须有其自身的建国与治国之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因此，此等国家又均必有其自身的一种哲学体系并据此哲学体系而产生的国家教育宗旨”^[16]。基于此，姜琦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自觉地提出了“创造一种新教育哲学以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主张“要站在中国自身的社会上去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怎样地建设’这一个问题”^[5]，“中国的教育目标应该照顾我们本国

社会的特殊性,去创造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目标”^[18],在探索中国教育思想独特发展道路方面,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姜琦遗憾地指出,虽然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的著述,但它们有些是“短篇论文,并非是一本有系统的体系之教育哲学的著作”,即使是已有的著作“却未曾说出中国教育究竟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5]。虽然因受时代条件限制而将“三民主义”作为当时中国教育哲学的基本宗旨,但姜琦始终强调,中国教育需要教育哲学在符合“世界的潮流”“教育的原理”基础上,符合“中国历史的背景”和“中国现代的要求”^[5]。

参考文献:

- [1] 姜琦. 何谓新教育[J]. 新教育, 1919(4): 360.
- [2] 陈维雄. 对“活教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J]. 人民教育, 1952(1): 28.
- [3] 姜琦. 论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之交界[J]. 教育研究, 1938(4): 1-5.
- [4] 姜琦. 文化侵略与文化抵抗[J]. 教育研究, 1938(3): 37-42.
- [5] 姜琦. 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 教育杂志, 1937(9-10): 21-30.
- [6] 姜琦. 教育哲学[M]. 上海: 群众图书公司, 1933.
- [7] 姜琦. 三民主义教育哲学述要[J]. 三民主义半月刊, 1945(3): 3-6.
- [8] 陈礼江. 序[A]. 姜琦. 训育与心理[C]. 重庆: 正中书局, 1944.
- [9] 顾毓琇. 介绍姜琦著《德育原理》[J]. 读书通讯, 1944(100): 42.
- [10] 姜琦. 中国国民道德原论·序[M]. 商务印书馆, 1944.
- [11] 姜琦. 中国学制修正方案之商榷[J]. 建国教育季刊, 1939(2): 15-28.
- [12] 姜琦. 大学教育之特质[J]. 高等教育季刊, 1942(4): 27-39.
- [13] 姜琦. 大学教育中之训导问题[J]. 训练月刊, 1941(1): 11-15.
- [14] 姜琦. 导师师资与分配问题之研究[J]. 教育通讯旬刊, 1942(26): 12-16.
- [15] 姜琦. 我国大学课程之基本原则[J]. 高等教育季刊, 1941(3): 25-28.
- [16] 姜琦. 中国师范教育制度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 教育通讯周刊, 1938(27): 4-7.
- [17] 姜琦. 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J]. 民意周刊, 1938(55-56): 10-12.
- [18] 姜琦. 学校社会化之哲学的基础及其史的发展[J]. 教育通讯周刊, 1939(2): 3-8.
- [19] 姜琦. 三民主义青年与各国青年底特征之比较[J]. 城固青年, 1941(1): 6-8.

Jiang Qi and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AO Zhen-ming¹, YAO Cong-li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 Jiang Qi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 educators teaching in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opposes the segregation of the usual from military education, and claims tha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a continuum. He enforces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tressing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national crisis. This reveals his far-reaching insight and academic stature in formulating the sinicized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Northwest University; Jiang Qi; educational thought; sinicization

[责任编辑 高小立]